林沄文集

考古学卷 下

上海古籍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上架建议：考古/古文字
ISBN 978-7-5325-9428-3
9 787532 594283 >
定价：228.00 元
易文网：www.ewen.co

林沄文集

考古学卷 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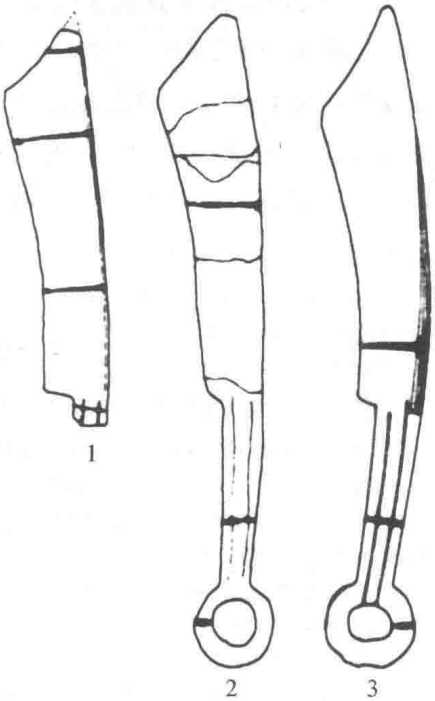
上海古籍出版社

从张家口白庙墓地出土的尖首刀谈起

1979年4～6月，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队的刘观民主持发掘了河北省张家口市庞家堡区白庙乡白庙村附近的一片墓地，一共发掘了一百多座墓葬。其中M57和M91各出土一件尖首刀币，这可能是在科学发掘的墓葬中最早发现的尖首刀币。但这批发掘资料迄今尚未发表报告，而刘观民先生已经作古了。当时，吉林大学考古专业的学生参加了这次发掘，而我曾辅导学生全面整理这批资料。现征得当时协助主持工作的刘晋祥学兄的同意，简单介绍这两件尖首刀的形制，并就相关的问题谈一些看法。

一

限于当时的工作条件，这两件刀币既未能照相，也未能称重，只是画了原大的线图（图一，1、2）。两件刀币都很薄，柄部扁平而和实用的刀明显有别，柄上都有两道细凸棱。其中M57出土的一件，虽断为五段，但可以拼合而推知全形。全长15.5厘米（尖部略有缺损，所



图一　张家口、延庆地区墓葬出土尖首刀
1. 白庙M91　2. 白庙M57　3. 葫芦沟M44

以新出范时全长估计可达16厘米），首宽2.3厘米弱，环径1.9厘米。M91出土的一件柄部已残。形状和大小与第一件差不多。只是首宽只有2.1厘米，而且刃缘明显起窄棱。刀背起脊的形式也和前一件不同。我细察过这两件刀币的表面，似乎隐约有字，但不能肯定其笔画究竟如何，也根本无法拓出。所以为谨慎起见，在线图上完全没有画。

二

对于白庙墓地的年代，有一个认识的过程。发掘初期曾因随葬品中有不少北方草原文化色彩的器物而认为是和汉代匈奴有关的遗存。整理过程中才逐渐认识到，它和怀来北辛堡墓葬[1]文化性质相同，应该是东周时代的遗存。

1979年在滦平炮台山[2]，1980年在怀来甘子堡[3]，1983年在张家口白庙[4]，1985年在宣化小白阳[5]，1985～1987年在延庆军都山葫芦沟、玉皇庙、西梁垛[6]，1989年和1993年在滦平梨树沟门[7]，1994年在延庆龙庆峡[8]，一再发掘了文化性质相同的大批墓葬。靳枫毅对先秦文献缺乏必要功底，先入为主地把这类遗存命名为“山戎文化”遗存[9]。而且还把文化性质不同的延庆西拨子窖藏和平泉东南沟墓葬也

[1] 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北怀来北辛堡战国墓》，《考古》1966年5期。

[2]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等：《滦平县虎什哈炮台山山戎墓地的发掘》，《文物资料丛刊（7）》，1983年。

[3] 贺勇等：《河北怀来甘子堡发现的春秋墓葬》，《文物春秋》1993年2期。

[4] 张家口市文物事业管理所：《张家口市白庙遗址清理简报》，《文物》1985年10期。

[5] 张家口市文物事业管理所等：《河北宣化县小白阳墓地发掘报告》，《文物》1987年5期。

[6]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山戎文化考古队：《北京延庆军都山东周山戎部落墓地发掘纪略》，《文物》1989年8期。

[7] 承德地区文物保护管理所等：《河北省滦平县梨树沟门墓群清理发掘简报》，《文物春秋》1994年2期。滦平县博物馆：《河北省滦平县梨树沟门山戎墓地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1995年5期。

[8]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龙庆峡别墅工程中发现的春秋时期墓葬》，《北京文物与考古》第4辑，1994年。

[9] 同注[6]。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误定为“山戎文化”[10]，给研究造成无谓的混乱。

对于以军都山东周墓地为代表的上述遗存的年代，过去看法不一致。最后，吉林大学的杨建华在她的博士论文中，把它们统分为三期（图二）。早期根据墓中出土的中原式青铜器（图三）可定为春秋中期。晚期应定为春秋晚期到战国初。至于炮台山和北辛堡墓葬为代表的末期，是燕文化已经占领该地之后，当地文化的残存。年代已晚到战国中期[11]。

根据这种分期观点，1979年发掘的白庙墓葬分属于早期和晚期，例如M54出土的刀子（图四，1），刀身为北方式，刀柄为中原式，和图二所示早期的那种翘尖的环首刀子相似，当属早期墓葬。M18出土两件刀子（图四，2、3），均为弧背，和图二所示晚期刀子相近，当属晚期墓葬。从图二和图四，1～3可以看出，早期的刀子一方面有纯粹的北方式刀子，另一方面也有既受中原文化影响而仍保留北方式翘尖特点的刀子，两种刀子都不可能成为尖首刀币的母型。只有晚期的弧背环首刀才能衍化为刀币。山西侯马上马晋国墓地[12]出弧背环首刀（图四，4、5）的墓葬也是春秋晚期的，可作比证。因此，出尖首刀币的墓都应归入晚期。也就是春秋晚期到战国初。白庙M91随葬的短剑式样和图二所示晚期的左起第四件短剑相似，也证明该墓确属晚期。

在这批墓葬中，除了上述1979年白庙M57和M91随葬尖首刀币之外，还有以下各墓也随葬尖首刀币：

玉皇庙M164、M172、M380，葫芦沟M44（图一，3）、M61、M87、M114、M151，炮台山M21。

此外玉皇庙和葫芦沟还有一些墓随葬“尖首刀币柄首坠”[13]。

据上述分期观点，这些尖首刀也可以定为春秋晚期到战国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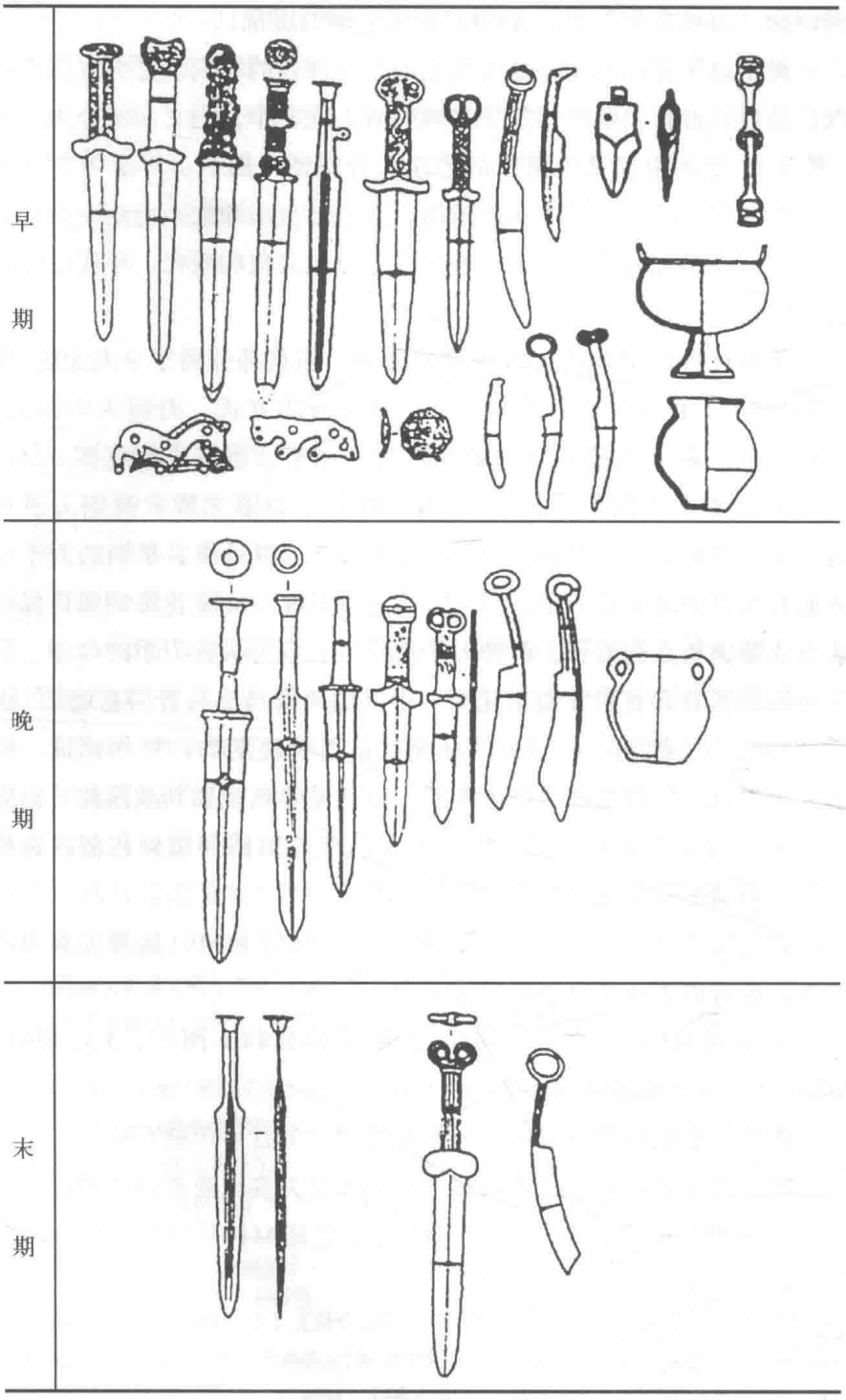
应该指出的是，靳枫毅过去因为玉皇庙M18、M32、M34和西

[10] 靳枫毅等：《山戎文化所含燕与中原文化因素之分析》，《考古学报》2001年1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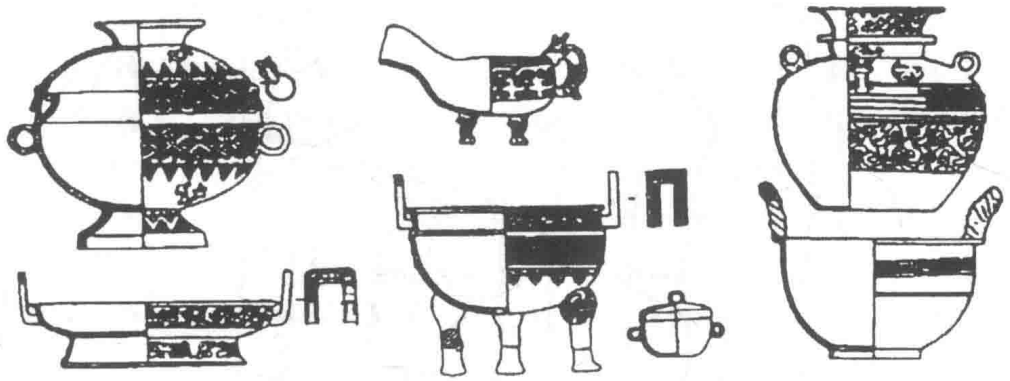
[11] 杨建华：《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北方文化带的形成》，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1年。

[12]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上马墓地》，文物出版社，1994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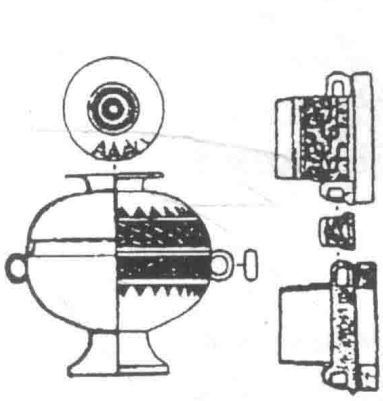
[13] 同注[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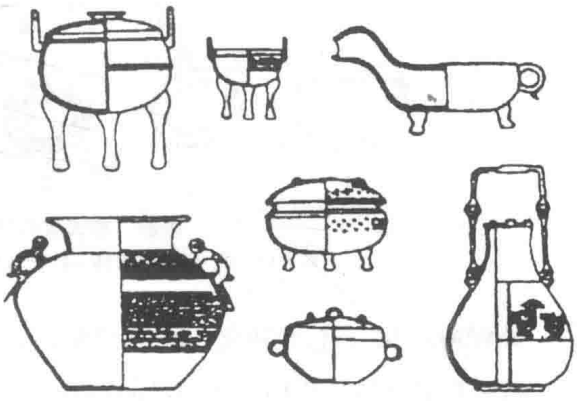
图二　军都山类型墓葬出土器物的分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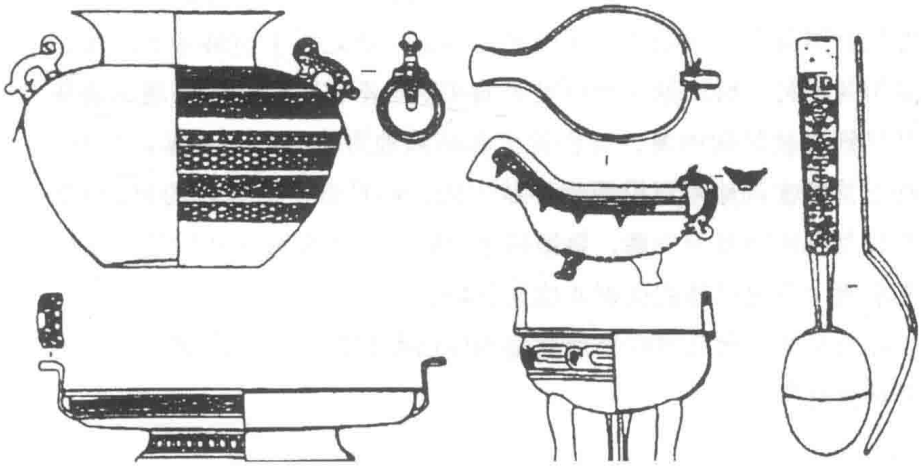
1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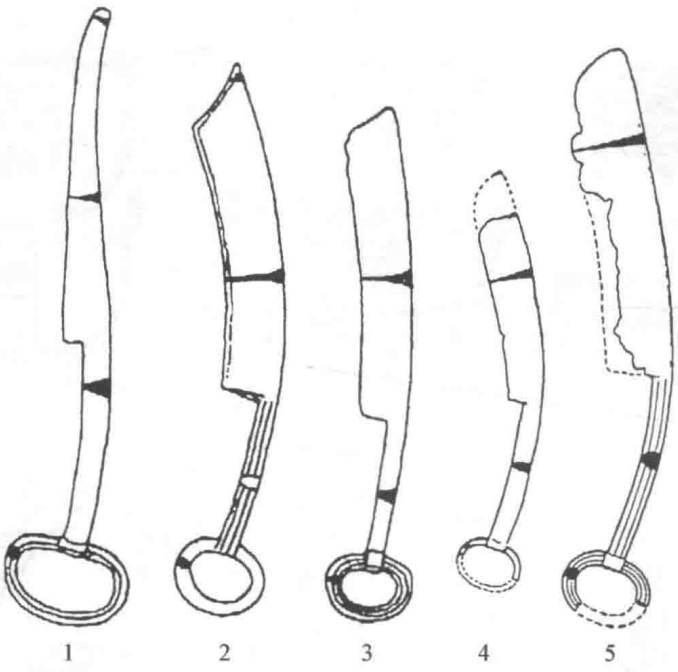


3



图三　军都山类型早期墓葬中随葬的中原式青铜礼器

1. 甘子堡M1　2. 西梁垛　3. 甘子堡M2　4. 玉皇庙M2



图四　各式实用刀子

1. 白庙M54　2、3. 白庙M18　4. 上马M2008　5. 上马M1005

梁垙M25出土圭首铜戈，推测“葫芦沟、西梁垙、玉皇庙三处墓地的上限，可能在西周、东周之际或春秋初期”[14]。后来又引用西梁垙M25木椁木炭的碳十四年代距今2 800 ± 80年为证[15]。其实西梁垙M25还随葬了铜铙，这种器物要到春秋中期才出现。可见圭首铜戈在该地是沿用到春秋中期才下葬的。而木椁可能是用了树龄很高的或存放多年的木料。所以他在最近发表的文章中不再坚持三个墓地的墓葬都有早到春秋早期的墓，却仍说玉皇庙墓地有春秋早期的墓。但是，既然圭首戈在该地可以沿用到春秋中期，而且玉皇庙墓地的M250也是圭首戈和铙同葬于一墓，要证明玉皇庙有早于春秋中期的墓，显然需要拿出圭首戈以外的证据才能站住脚。

综上所述，冀北地区目前在墓葬中已发现的尖首刀币的年代均不早于春秋晚期。

---

[14] 同注[6]。

[15] 靳枫毅：《军都山山戎文化墓地葬制与主要器物特征》，《辽海文物学刊》1991年1期。

按黄锡全对尖首刀币的分型意见，葫芦沟M44出土的尖首刀形体较大［长16厘米、首宽3.2厘米（其实是2.3厘米之误）、环径2.15厘米］，刀首相当宽，背部弧度大，被作为甲型Ⅱ式的标本[16]。白庙M57出土的一件，体稍小，刀首稍窄，背部弧度稍小，似可归为乙型。白庙M91出土的一件，体更小、首更窄，背部弧度更小，而且刀刃有廓，似应归为丙型Ⅰ式。实际上，从纯粹的类型学观点来看，黄锡全所分的甲型Ⅱ式→乙型Ⅰ式→乙型Ⅱ式→丙型Ⅰ式可视为同一个型的连续演化的各个式别。而葫芦沟M44出土的那种尖首刀币，在形态上最接近于白庙M18出土的一件实用的弧背环首刀（图四，2）。M18出土的这件刀的刀首像尖首刀币一样作凹弧形，这很有力地证明了尖首刀是起源于该地区的。如果将来冀北地区墓中所出的实用弧背刀和尖首刀币能全部公布出来，相信可以对尖首刀币在春秋晚期到战国的形态演变序列提供更有力的依据。

三

上述冀北地区的东周墓葬在文化上有相当多的共性。不过要细分起来，位于西部的怀来、延庆、宣化、张家口的墓葬和位于东部的滦平等地的墓葬是有差别的、东部地区受时代更早的夏家店文化的影响更多，文化面貌更复杂一些。

我过去曾提出过怀来、延庆、宣化、张家口地区的春秋到战国初的墓葬是代国遗存[17]。认为赵襄子元年（公元前457年）所灭代国的中心实际是在怀来、延庆一带，所以在怀来以西不远的鸡鸣山，后来才会有为磨笄于山而自杀的代王夫人（赵襄子的姐姐）所建的祠屋。这种曾经很发达的文化在战国初突然衰落，应该是赵灭代的结果。

在晋北地区也发现过和冀北地区面貌相近的东周墓葬，其中，浑源李峪村墓地在1923年就被盗掘，器物大部流散海外，引起了中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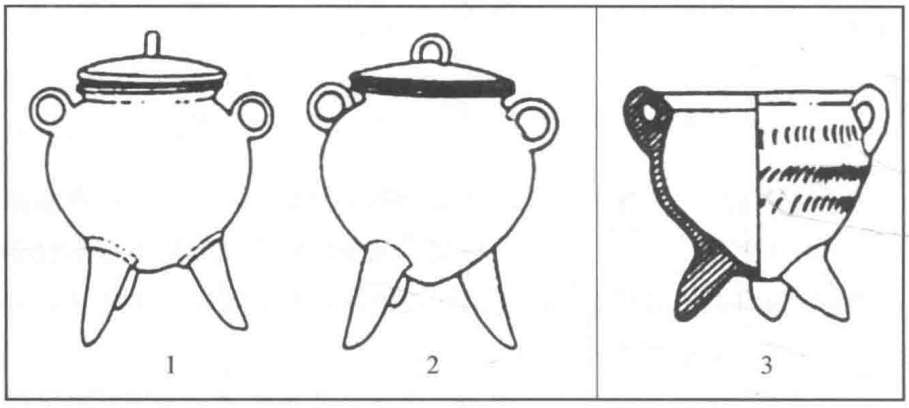
[16] 黄锡全：《尖首刀币的发现与研究》，《广州文物考古集》，文物出版社，1998年。

[17] 林沄：《关于中国的对匈奴族源的考古学研究》，《内蒙古文物考古》1993年1、2期合刊。

学者的重视[18]。1963年后又陆续有新的发现，1978年做过钻探和试掘[19]。李夏廷对这个墓地的器物进行了综合研究，认为墓地的年代早于赵灭代，有可能是代国被灭前最后一处大型墓地[20]。

赵襄子所灭的代，过去一般都认为是在今天河北和山西交界处的蔚县。但是该地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现东周的墓葬。

怀来、延庆、张家口、宣化在蔚县以东，浑源则在蔚县以西，相隔颇远，但文化上却确有联系。最突出的一点是：张家口到延庆的东周墓葬中都出一种有指甲纹的三足鼎形罐（图五，3），这种器物在桑干河中下游及其支流洋河、白河、潮河、滦河，伊逊河的考古调查中均有发现。而李峪村则出土了显然是按这种特定形式的陶器铸造的青铜器（图五，1、2），是非常值得注意的。



图五　双耳三足器

1、2. 浑源李峪墓葬　3. 葫芦沟M52

其实，怀来、蔚县、浑源虽然相距较远，但都是在桑干河的河谷中。这个河谷古称“代谷”。如《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称刘邦略地于边，“闻匈奴聚于代谷之外而欲击之。……遂北至于代谷，果有平城之

[18] 商承祚：《浑源彝器图》，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1936年。

[19]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浑源县李峪村东周墓》，《考古》1983年8期。

[20] 李夏廷：《浑源彝器研究》，《文物》1992年10期。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围”。《水经注·漯水》引西汉时梅福上事之言：“代谷者，恒山在其南，北塞在其北。谷中之地，上谷在东，代郡在西。”也就是说，虽然这个谷地后来因分属赵燕，而其地分置为代郡、上谷郡，但在地理上还是统称为代。赵襄子所灭的代，中心究竟在何处？这是一个需要进一步做考古工作才能最后解决的问题。但在战国初年以前，在这个谷地中可能存在不同于中原各国的同一个考古学文化，则是已经有相当线索了。

如果换一个角度，不是从国别而是从族别来看，代国应该是狄人建立的。所以，《史记·赵世家》记载赵襄子的父亲赵简子自述做了一个梦：“吾见儿在帝侧，帝属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长以赐之。’”上帝派来替赵简子解梦的使者说：“翟犬者，代之先也。主君之子且必有代。”韩嘉谷认为军都山类型的墓葬应该是白狄的遗存[21]，实则上和我的意见是一致的。

韩嘉谷认为，军都山类型所代表的狄，是由陕北和内蒙古伊克昭盟（现鄂尔多斯市），经过山西北部到达冀北的。根据是桃红巴拉、毛庆沟等地的东周墓葬和军都山墓葬的随葬品有相似性。我基本上同意他设想的狄人东进的路线，但并不同意他的论证方法。因为，从夏到东周，长城地带的文化遗存一般都带有北方草原文化的成分，并不能用这种普遍的共性来论证这一地带一定有族的一致性。但是，如果注意到“代谷”是一条东西向的天然通道，而其西方正通向草原，在这条古代通道向西的延长线上，确实可以找到一些引人注目的特殊的文化一致性，暗示着这条通道上曾经发生过的族群的迁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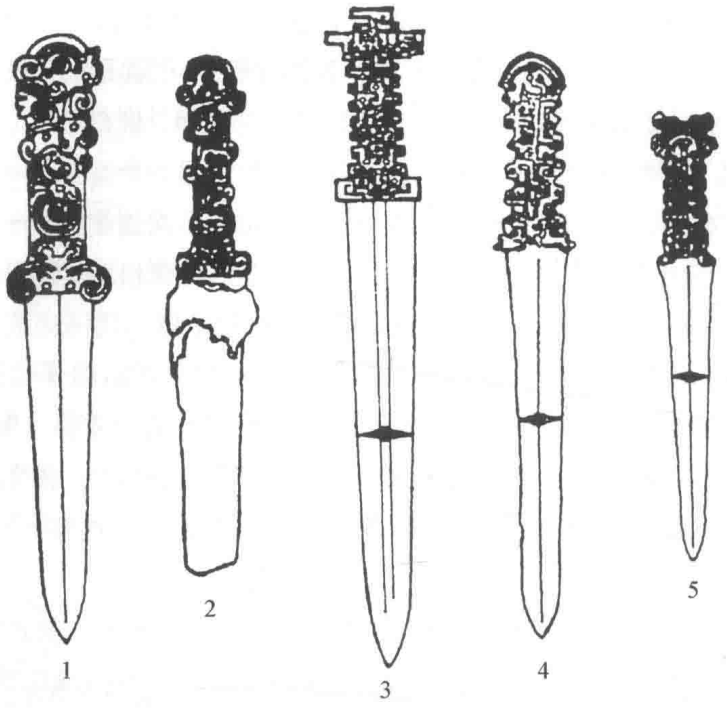
（一）“秦式剑”

张天恩认为，甘肃宁县宇村M1出土的青铜短剑（图六，1）是在秦地屡有发现的“秦式剑”（图六，2、3）的直接前身[22]。宇村M1其实是兼有周式铜器和北方式铜器（如小罐、匙）的北方民族的墓。时代可定在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23]。“秦式剑”竟然也出现于怀来的

[21] 韩嘉谷：《燕国境内诸考古学文化的族属探索》，《北京建城3040年暨燕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专辑》，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

[22] 张天恩：《再论秦式短剑》，《考古》1995年9期。

[23] 许俊臣等：《甘肃宁县出土西周青铜器》，《考古》1985年4期。



图六　“秦式剑”的分布

1. 宁县宇村　2. 陇县边家庄　3. 宝鸡益门　4. 怀来安营堡　5. 滦平西山

安营堡，甚至更东的滦平西山墓中[24]（图六，4、5）。可见这种形式特殊的剑并不是秦文化的剑，而是一种和秦人有一定交往的北方族团特有的剑。在英国不列颠博物院收藏的一件“秦式剑”的金剑首，据称是山西浑源古墓出土的[25]，可见“秦式剑”是沿代谷东传的。

（二）虎形牌饰

宇村M1出土虎形的铜牌饰（图七，1）[26]，这种虎形牌饰也发现于鄂尔多斯地区（图七，2、3）[27]，并发现于延庆、怀来、宣化乃至滦平（图七，4、5）[28]。在怀来、延庆的随葬青铜礼器的墓中，虎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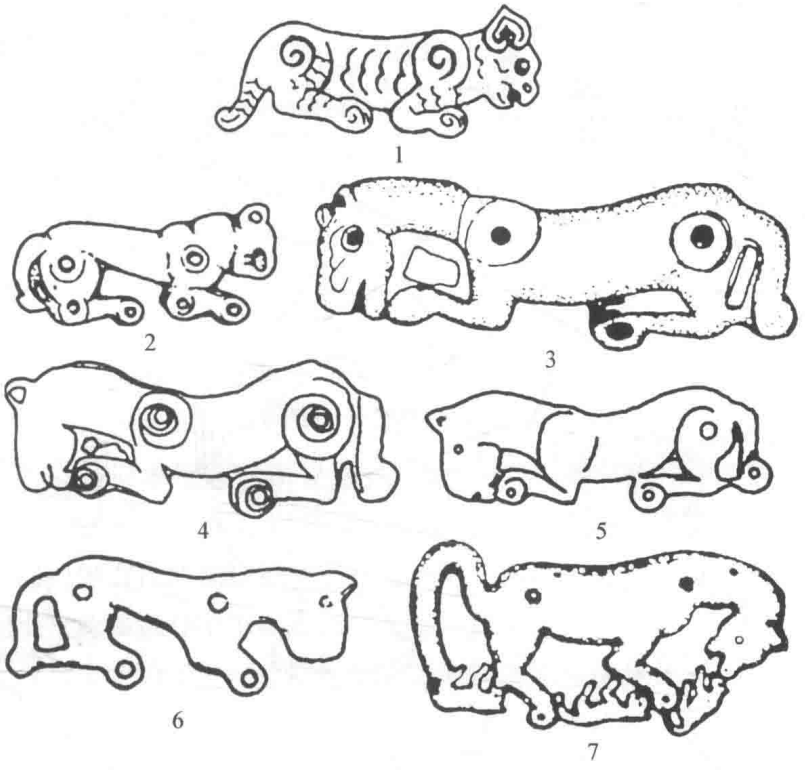
[24] 郑绍宗：《中国北方地区青铜短剑的分期及形制研究》，《文物》1984年2期。

[25] 李学勤：《益门村金、玉器纹饰研究》，《文物》1993年10期。

[26] 同注[23]。

[27] 田广金、郭素新：《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研究》，《鄂尔多斯式青铜器》，文物出版社，1986年，图五八，6、7。

[28] 同注[3]、注[5]、注[6]、注[24]。



图七　虎形牌饰的分布

1. 宁县宇村　2、3. 鄂尔多斯　4. 延庆玉皇庙　5. 宣化小白阳　6. 行唐钓鱼台（金质）　7. 新乐中同

牌饰有金质的，足见其不是一般装饰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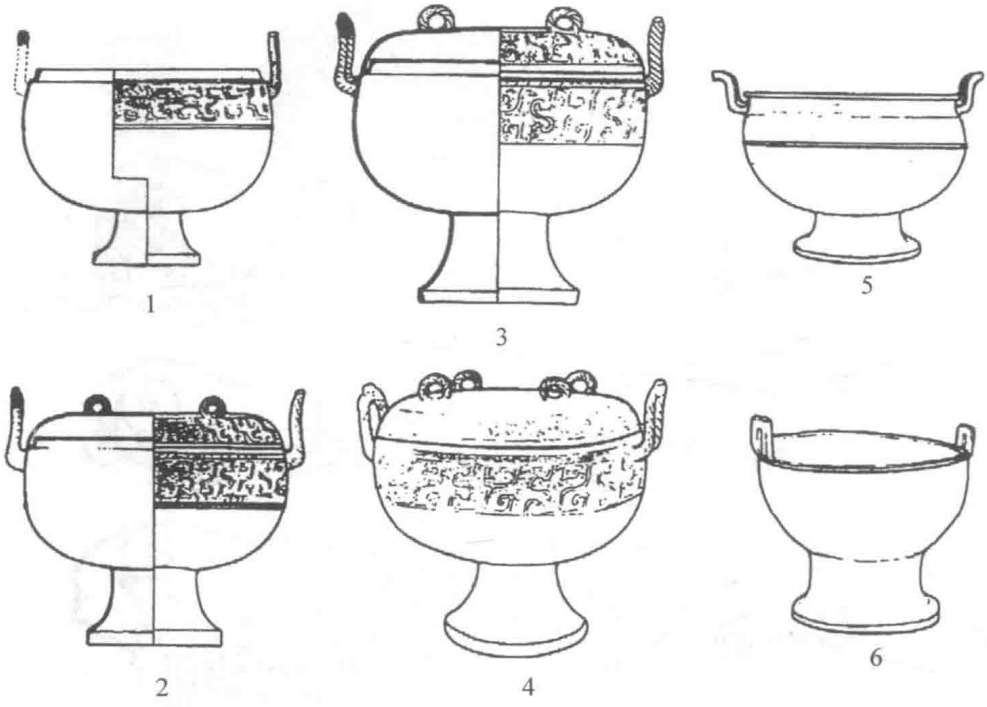
（三）异型釜

在内蒙古准格尔旗的宝亥社曾发现过圆角方口、附耳的异形釜（图八，1）[29]，口沿还做成子母口，可以加盖（盖已失去）。北方民族的釜本是圆口、立耳、无盖的。显然是受中原文化影响的结果。纹饰也是中原式的了。很相近的器物在浑源出了三件（图八，3、4）[30]，在山西的原平也出过一件（图八，2）[31]。时代较晚的怀来北辛堡墓中出土的釜（图八，5），虽是圆口的，附耳和腹型也反映了中原式铜

[29] 王志浩等：《内蒙古准格尔旗宝亥社发现青铜器》，《文物》1987年12期。

[30] 同注[20]。

[31] 李有成：《原平县刘庄塔岗梁东周墓》，《文物》1986年11期。



图八　各式铜釜的分布

1. 准格尔旗宝亥社　2. 原平塔岗梁　3、4. 浑源李峪　5. 怀来北辛堡　6. 新乐中同

器的影响[32]。

所以，桑干河谷地中东周时代的居民，确有西来的迹象。

在战国初期，桑干河各地原先的文化衰落后，在河北唐县、行唐、新乐、灵寿等地发现的战国墓葬，有继承军都山类型文化的一面。除了和怀来甘子堡[33]、延庆军都山墓葬[34]一样也随葬北方式铜釜（图八，6）[35]外，最明显的两点是：按旧传统在墓中随葬金质的虎形牌饰（图七，6、7）[36]，按新传统在墓中随葬尖首刀[37]。所以，

[32] 同注[1]。

[33] 同注[3]。

[34] 同注[15]。

[35] 同注[20]，图五，7，新乐中同出土。

[36] 同注[20]，图一四，18，行唐钓鱼台出土。石家庄地区文物研究所：《河北新乐县中同村战国墓》，《考古》1984年11期。

[37] 陈应祺：《中山国灵寿城址出土货币研究》，《中国钱币》1995年2期。

这一支建立了中山国的人群，显然和桑干河的人群应该是同一族群的。

综上所述，从尖首刀的主要分布区来看，黄锡全说它是“狄刀”是很有道理的。

四

从文献上看，狄人除代和中山之外还建立过一系列古国。从考古上看，狄人至少在春秋晚期已开始铸造有自己特点的金属货币。所以，我们不应该继续被错误的旧史观所束缚而仍把狄人看成是什么“游牧民族”。

把我国古代的戎狄想象成后来匈奴、东胡一样的游牧人，这是在战国秦汉的知识分子中很流行的观念。以至于大史学家司马迁也不例外。我过去写的《戎狄非胡论》一文批驳过这种错误观念[38]，从已有的考古研究成果可以看出，我国现今长城以北的地区，在新石器时代是农业定居文化的分布区，到了夏代，像内蒙古东南部的夏家店下层文化、河套的朱开沟文化、河西走廊的四坝文化，也都是农业定居文化。到气候逐渐干冷化后，这个地区的居民中畜牧业的比重增加了，但仍是农牧兼营的定居文化。例如商周之际在陕北的李家崖文化仍筑城而居，两周之际在内蒙古东南部的夏家店上层文化仍建造石砌墙基的住房，除养牛羊外也养猪鸡。所以，在这种大的历史文化背景下，实在难以设想在西周到春秋广布于北方地区的戎狄会是什么“游牧民族”。从人种鉴定的结果来看，戎狄也应该是和华夏一样的东亚蒙古人种，而不是匈奴、东胡那样的北亚蒙古人种。所以，戎狄和华夏的差别主要只是“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左传·襄公十二年》）。当然，他们农业的发达程度可能低于华夏，比如，还没有大规模的固定耕地，所以可以像商人在盘庚迁殷以前那样把都城迁来迁去。就像《左传·襄公四年》说的那样，“戎狄荐居，贵货易土”（《诗·节南山》

[38] 林沄：《戎狄非胡论》，《金景芳九五诞辰纪念文集》，吉林文史出版社，1996年。

“天方荐瘥”，《云汉》“饥馑荐臻”，荐为一再、频仍之义，所以“荐居”应是常常移动居处）。其实盘庚在动员人民徙居时强调要“具乃贝玉”，也是“贵货易土”的。

从文献上看，《国语·晋语一》记晋献公伐翟柤，“却叔虎将乘城……被羽先升”。《晋语九》：“中行穆子帅师伐狄，围鼓，鼓人或请以城叛。”都证明狄人是筑城而居的。《左传·昭公元年》记晋人与无终及群狄战于大原，魏舒说：“彼徒我车，所遇又厄，以什共车，必克。”可见狄人只有步兵，没有骑兵。《管子·小匡》中说：齐桓公“禽狄王，败胡貉，破屠何，而骑寇始服”。有不少人用来证明狄人是骑马的游牧人。吕思勉在《读史札记·骑射》中早已指出：《小匡》“乃战国时语，非当时实事”。其实，《小匡》中还提到了“南至牂柯”，据《华阳国志》：“楚顷襄王时，遣庄蹻伐夜郎。……既灭夜郎，以且兰有椓船柯处，乃改其名为牂柯。”则此地名战国晚期才出现。而《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要到西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唐蒙山使南越，才听说南越西北有牂柯。然后才有“发巴蜀卒治道，自僰道指牂柯江”。到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才“平南夷为牂柯郡”。所以《小匡》成书的年代甚至可能晚到汉代，不足以证明东周时的狄人真是“骑寇”。

就军都山类型的考古遗存本身来看，它在桑干河谷中留下了分布较密而规模较大的多处墓地，而且在白庙还发现了文化层厚半米以上的居地，很难设想是游牧人所遗下的。从墓葬中普遍殉牲来看，墓主人确有重视畜牧业的传统；但殉马的数量不多，而且集中在有青铜礼器的较大的墓葬，和草原地区殉牲以马为主的情况显然不同；而殉狗特别多是这里的特色。从墓中的随葬品可以看出，在早期（即春秋中期）的墓中，已经出现不少从华夏各国引进的东西。较高等级的墓中常有华夏各国生产的青铜礼器和车马器（图三），但在器类上，当作酒杯的铜最多，贮酒的壶、罍次之。鼎簋不如盘匜受重视，都反映了墓主在生活习俗和理念上不同于华夏。在武器上，中原的戈颇受重视，短剑在晚期已经有不少采用中原式的柄首。工具中中原式的刀（削）在早期已对北方式的刀产生影响，到晚期已基本取代了北方式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